

埃及研究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流动问题刍议^{*}

毕健康 陈 勇

摘 要: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是那些出于工作需要而暂时居于国外的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埃及社会的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在移民过程中,埃及国际劳工的财产、收入大幅增长,职业地位获得一定提升;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中下层人群逐渐跻身社会中间阶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国际劳工移民虽已成为埃及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但仍不足以成为构建埃及现代社会流动模式的主要基础,其消极影响主要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埃及农村社会公平的实现;对埃及失业问题具有双重影响;阻碍了埃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

关键词: 当代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社会流动

作者简介: 毕健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10);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1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6-0102-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愈益明显,社会流动步伐加速。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① 社会流动在向度上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即纵向流动,是指个体或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如果转移后的社会位置高于转移前的社会位置,即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反之,则是向下的社会流动。水平流动即横向流动,是指个体或群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当代埃及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同志、匿名评审专家和李安山教授对于本文的修改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导言》,载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页。

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同等或同一水平的社会位置上。代内流动考察个体在自己一生中社会位置是否变动及其变动规律,主要探讨其职业生涯的动态轨迹。代际流动则比较研究上下两代之间社会位置的异同及其变化。^①

一般而言,社会流动与社会现代化程度呈正向关系。在传统农牧业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由先赋性因素决定的,阶级、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界限分明,难以逾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小。随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强劲推动下,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分工、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加速进行,对人才的需求也愈益紧迫,社会流动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成为社会流动的强大动力。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渠道畅通,社会流动率高,不仅实现了劳动力与人才的合理配置,而且使社会和经济充满活力,并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埃及作为现代化滞后的后发型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极为曲折,发展道路明显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在纳赛尔时期,埃及曾一度大力推进工业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埃及始终在工业化的边缘徘徊,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合理、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程度低等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埃及奉行开放政策,但工业化进程不进反退。石油出口、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侨汇等所谓的四大支柱产业无一属于核心制造业,且极易受到地区和国际局势以及全球油价波动的影响。1973年“十月战争”后,石油价格的飙升与萨达特推行的开放政策,使劳务输出即国际劳工移民成为埃及的国策之一。大规模的国际劳工移民及其侨汇的流入,对于埃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流动,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本文在扼要梳理埃及劳工国际移民的动因、历程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状况,探讨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社会流动和社会现代化产生的影响。

一、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因及其社会地位

一般而言,国际移民是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②。国际劳工移民属于工作移民,即出于工作或改善生活的需求等原因,由出生地迁往现居住地的活动。工作移民又分为技术移民、合同移

^① 刘祖云:《论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及其社会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第48~50页。

^②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页。

民、季节移民、非固定移民、项目性移民等。^①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大多为非固定移民、项目性移民和合同性移民,技术移民较少。从时间角度看,国际劳工移民又分为暂时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两者的劳工组成结构多有不同。暂时性移民一直是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埃及的官方统计中,凡是迁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均列入暂时性移民,大多保留埃及国籍;迁移到非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则列为永久性移民。然而,国际移民应用研究财团(Consortium for Applie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在 2010 年 4 月出版的《移民概览:埃及》中指出,埃及移民正在发生暂时移民永久化的变化,迁移到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开始长期居住,其数量超过了迁移到欧洲和北美的永久性移民。

(一)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因

国际移民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和现象,早在 19 世纪末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由此出现了各种移民理论流派,包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移民动因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基于墨西哥移民运动实证研究提出的新经济移民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理性选择理论等。^② 对于埃及国际移民的动因,朴素的“推拉理论”颇具解释力。1885 年和 1889 年,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在《皇家统计学会杂志》上两次发表题为《移民规律》的论文,提出了移民运动的七个动因,对移民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66 年,埃弗雷特·李(Everett S. Lee)进一步阐述和完善了拉文斯坦的“推拉理论”,系统探讨了移民规模、移民潮与移民特征。关于移民动因,李提出了迁出国因素、目的国(迁入国)因素、干扰性障碍(intervening obstacles)和个人因素。他将促进移民的因素标为“+”,阻扰移民的因素标为“-”,认为个人(非理性)因素不具有普遍意义,移民行为是“+”>“-”的产物。同时他提出,在迁出国与目的国之间存在一些“干扰性障碍”,这些障碍有时微不足道,有时却不可逾越。比如,远距离跨国旅行必需筹备的旅费等开支对于底层家庭而言便是难以逾越的障碍。^③

埃弗雷特指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作为人的内在欲望,是移民运动最为直接的强劲动力。安瓦尔·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增长迅速,1975~1982 年埃及年均经济增长率达 8.4%。^④ 消费性开放和两极分化的加剧,刺激了人们改善生活的强烈欲望。1973 年“十月战争”停火后,埃及逐渐从战争走向和平,阿以

①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第 4 页。

② 关于西方移民理论各流派概况及其争鸣,参见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第 12-18 页;李明欢:《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第 1-9 页。

③ Everett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1966, pp. 50-51.

④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61 页。

和平进程在激烈的反对浪潮中艰难启动,大规模的军人复员加剧了埃及国内的就业压力。萨达特政权抓住海湾阿拉伯国家等亟需引进劳动力的大好时机,废除所谓的“出境签证”,鼓励劳务输出,成为埃及国际劳工移民最重要的“推力”。地缘相近、信仰和语言同一性以及共享阿拉伯帝国的久远历史及其辉煌等是促进埃及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移民的重要的“软拉力”。调查显示,73.7%的埃及劳工出于经济目的参与国际移民。^①

“推力”具体体现在埃及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村人地矛盾与失业问题加剧,以及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等方面。其一,埃及人口增长快速,埃及农村地区尤为明显。1976年,埃及农村人口约为2,060万,1996年达3,402万。^②同时,农村产业发展长期失衡,农村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1986年和1996年埃及人口普查显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65%和51.6%,^③但同期埃及的可耕地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因此,埃及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大量年轻人无地可耕,失业问题加剧。据埃及官方统计,1976年农村失业率为6.8%,1986年上升到13.7%。^④农村人口大面积失业促使大量的农村年轻人涌入了就业机会更多的大城市和阿拉伯产油国。其二,埃及教育发展不平衡和就业政策调整。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但教育尤其是中专教育质量下降。^⑤20世纪80年代中期,埃及政府停止中专毕业生就业分配政策,使中专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加剧。大量失业的中专毕业生选择了加入国际劳工移民的大军。

埃及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交往的中枢地区,历史上具有开放传统。作为文明古国和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埃及一直在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和专业人才,包括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执政者提供政府顾问,向伊拉克等国家输出教师等专业人才。1952年七月革命前,只有少量埃及人移民欧美发达国家。纳赛尔时期,埃及经历短暂的封闭后,仍为向外移民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便利。1964年,埃及政府开始允许国民出国攻读硕士学位,1967年宣布移民为政府允许的“合法活动”。1962~1968年间,埃及向外移民13,113人,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⑥

1973年十月战争后,国际油价飞涨,萨达特政府废除“出境签证”,埃及进入了大

① Jesús Alquézar Sabadie, *Migration and Skills: The Experience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Albania, Egypt, Moldova, and Tunisia*,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0, p. 23.

②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2, p. 20.

③ Ibid., p. 13.

④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⑤ 毕健康、陈勇:《当代埃及教育发展与社会流动问题评析》,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114~125页。

⑥ Ali E. Hillal Dessouki, “The Shift in Egypt’s Migration Policy: 1952–197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8, No. 1, 1982, p. 56.

规模向外输出劳工的新时期,但受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油价波动的影响,埃及国际劳工移民随之起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74~1984年,埃及进入高速发展期,埃及国际劳工增长迅速,但后期受到来自亚洲的廉价劳工冲击;1984~1987年,受石油价格疲软所累,海湾国家对建筑工人的需求减少,同时阿拉伯国家开始发展本国人力资源来取代外籍劳工,埃及劳工移民规模有所缩小;1988~1992年,埃及政府因国内失业问题严重,积极开拓海外劳工市场,国际劳工数量略有增长,但海湾战争的爆发以及持续减少的新劳工合同导致埃及劳工大规模回流;1992~2004年,埃及劳工数量恢复到海湾战争前水平,但该时期海湾国家对埃及劳工的限制更加严格。

据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①,1970年埃及国际移民约7万人,1976年猛增到140万人。^②根据国际移民应用研究财团的数据,1998年埃及移民总数达4,887,696人。其中,暂时性移民3,520,477人,移民到阿拉伯国家3,511,859人,其他非洲国家2,545人,亚洲国家6,073人;永久性移民1,367,219人,移民到澳大利亚80,350人,欧洲国家506,028人,美洲国家780,841人。^③数据显示,美国和意大利是埃及永久性移民首选的美洲和欧洲国家,到美国的埃及移民占埃及国际永久性移民的40%以上。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10年埃及国际移民总数为3,739,111人,^④其规模比1998年下降了23%。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最新统计,2015年埃及国际移民为2,685,352人。^⑤大致说来,埃及70%左右的国际移民迁移到阿拉伯国家,其中沙特阿拉伯占30%以上。与移民规模波动一致,埃及的侨汇收入上下变动不居:2004~2005年埃及侨汇收入仅31亿美元;2007~2008年达到86亿美元,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4.1%;^⑥2013~2014年侨汇增长到185亿美元;2014~2015年超过190亿美元。^⑦

总之,尽管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只占总人口的约5%,侨汇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4%,但对于国际移民的社会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却产生了重要的边际效益。

①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和统计数据滞后,本文难以提供完整、准确和系统的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统计数据。

② 谢尧:《埃及对外移民问题研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第10页。

③ Report by Consortium for Applie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8, p. 12.

④ World Bank,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 Book* 2011, Washington, D. 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p. 109.

⑤ IOM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igration to, from an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Data Snapsho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pril 2016, p. 3,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country/mena/Migration-in-MENA_Data%20snapshot_April2016.pdf, 登录时间:2016年8月19日。

⑥ Anna Di Bartolomeo et al., *CARIM - Migration Profile: Egypt*, Consortium for Applie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pril 2010, p. 3, www.egypt.iom.int/Doc/CARIM_2010_Egypt_Migration_Profile.pdf, 登录时间:2016年3月7日。

⑦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gypt-Fact Feets* 2015, p. 1.

（二）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社会地位的获得

社会的阶层结构既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社会阶层存在多个维度的划分标准,如收入、职业、权力、教育和生活方式等。社会分层标准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在传统等级社会中,以血缘和政治地位为主的等级身份,无疑是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而在变动不居、社会流动迅速的现代社会中,财产和收入基本取代了等级身份,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财产和收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获得商品、服务、权力和威望等稀缺资源的能力,进而深刻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职业区分是现代工业发展、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的产物,不同的职业标志着占有或使用社会资源的不同。职业身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成员社会地位最基本的体现。因此,当前国际学术界比较通用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为财产、收入和职业。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地位“内外有别”。他们经常在迁入国遭到歧视,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迁入国国民恶劣。但与埃及国内工人相比,埃及国际劳工的财产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不仅获得了新的从业经验和职业技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总而言之,埃及国际劳工移民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下文从财产、收入增长、职业地位提升、移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等方面,考察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社会流动的推动作用。

二、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内部成员复杂,尚未构成一个社会阶层,更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阶层意识。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与其财产收入、职业、思想文化、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等方面密切相关,移民前后社会属性的改变也是影响该群体社会流动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埃及国际劳工移民财产、收入呈现大幅增长

埃及的国际劳工主要来自埃及社会的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家庭。埃及农村劳工参加国际移民的可能性与人均收入成倒U形关系,即中等收入的农村男性比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更有参加迁移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初,在埃及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包括汇款)10~50埃镑的农村人口中,20~35埃镑的家庭迁移率最高。^①不过,另一项对埃及国际劳工财产背景的调查显示,国际劳工来自社会底层。调查发现,

^① Richard H. Adams, Jr., "The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Rural Egypt,"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0, No. 1, 1993, p. 160.

无地家庭的男子成为国际劳工的概率最大,农村无地男子有 20.6%的概率参加国际迁移,但当有 5 费丹土地的时候,可能性降至 11.8%。^① 这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异是因调查内容与调查时间的不同所致。前者以人均收入为调查内容,后者则以土地的占有数量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跨度约 10 年。综合来看,国际移民对埃及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吸引力较大,因为相对于参与国内移民的劳工,前往海湾国家的国际劳工往往需要花费一笔高昂的费用,以向劳务代理公司购买劳工证。21 世纪初,这笔开支在 4,000 埃镑到 20,000 埃镑之间,远非埃及底层民众能够轻易承受。^② 这就是前述的“干扰性障碍”。

国际劳工移民使劳工在收入上有了极大提升,促使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也有程度区分。从宏观层面看,埃及侨汇收入在 1973 年之后增长较快,并从 1974 年的 2,730 万美元增加到 2001 年达 28,760 万美元。其中,1992 年达到 61,040 万美元的顶峰。^③ 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2012 年埃及侨汇收入达 190 亿美元,较 2011 年增加 40 亿美元。^④ 侨汇的增长反映了埃及国际劳工收入总量的增加。从微观层面看,劳工移民个体的工资或收入水平也有大幅度上升。例如,1977 年前往沙特的建筑工人工资与在埃及相比翻了 11 倍,大学教员工资翻了 7 倍,普通教师工资翻了 8 倍。^⑤ 埃及国际劳工的收入相对国内劳工提升较快,促使其在收入分层中实现向上流动。明亚省 1986~1987 年的调查数据将 1,000 户家庭按家庭总收入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均分成五个层次,证实了上述结论。其中,国际劳工家庭在收入最高的前 20%的家庭中占比提升至 23.14%,在第二个 20%的占比增至 26.72%,但在最贫困 20%的占比降至 15.98%。^⑥ 可见,由于侨汇收入,国际劳工在高收入阶层(富有的 40%)所占比率接近 50%,表明许多来自社会中下收入阶层的国际劳工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埃及回流劳工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侨汇对国际劳工收入的提升作用。同样是明亚省 1986~1987 年的调查数据,将劳工分成已回流劳工家庭和

① Ayman Zohry,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A Study of Upper Egyptian Laborers in Cairo*, 2002, p. 156.

② Ayman Zohry,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gypt: A Pilot Stud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and Poverty, University of Sussex at Brighton, July 2005, p. 80.

③ Heba Nassar, *Migration,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in Egypt*,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5, p. 38.

④ 胡英华:《埃及 2012 年侨汇收入持续上升,达到 190 亿美元》,载《经济日报》2013 年 1 月 22 日,第 8 版。

⑤ Bent Hansen and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qu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Egypt in the 1980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A Report of An Inter-agency Team financed by the UNDP and organized by the ILO, 1982, p. 91.

⑥ Richard H. Adams, Jr.,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8, 1989, p. 65.

仍留在国外劳工家庭两组。在每组内依次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并分成五个层次。在最富的 20% 家庭中,回流劳工仅占 11.48%,仍留在国外的劳工占比达 28.57%;在次富的 20% 家庭中,回流劳工占 18.85%,仍留在国外劳工占 23.53%。^①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由于回流劳工收入下降,他们在收入分层中的地位下滑,从而证明了侨汇收入对于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同时,埃及劳工内部的收入增长程度不同,来自埃及中间阶层的高技术劳工相对普通劳工的收入提升更大。1980 年,占国际劳工 10% 的高技术中间阶层大致占汇款总额的 30%。^② 不过即便如此,普通国际劳工相对于埃及国内劳工收入增长依然很大。剩下 90% 的普通劳工汇款 14 亿美元,人均 2,800 美元,而 1979 年埃及国内人均年收入仅为 358 美元。^③ 此外,回流劳工大多利用在国外攒下的积蓄,购买小块土地、农业机械和牲畜,或者开办小企业,从而拓宽了收入渠道,在其增加收入的同时,职业地位亦有所提升。

(二)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职业地位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埃及国际劳工最初从事的职业几乎包含了埃及所有的职业类型,但主要限于社会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无技术劳工。

1973 年前,埃及的国际移民主要是政府派往阿拉伯国家的教师或高技术专家。1973 年以来,埃及国际劳工从事的职业扩展到几乎所有职业类型,且数量增长较快。数据显示,1972 年,埃及政府派遣的人数为 13,478 人,1980 年增至 37,281 人,但政府派遣劳工占总国际劳工移民的比率却持续下降,从 27% 减少到 9.9%。^④ 这一情况表明,基于私人合同的移民劳工占国际劳工的比例大幅度提升。这些基于私人合同的劳工最初职业多为无技术劳工,在私营或公营部门就业。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回流劳工最初的职业结构体现为:出国前一半为生产性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和搬运工,有 11% 的劳工原本从事农牧业生产,同时 58.3% 的劳工出国前在私营和合作部门就业,还有 13.8% 出国前没有工作。^⑤ 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埃及国际劳工的职业构成和技能水平发生了改变,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上升,无技术劳工比例下降。其中,1985 年科学技术人员占埃及劳务合同总数的 20.4%,2002 年增长至 41%,

① Richard H. Adams, Jr.,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p. 66.

②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12. 由于缺乏占劳工总数 10% 高技术中产阶级在汇款中的数据,该数字为笔者大致估算。

③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12.

④ Heba Handoussa and Gillian Potter, *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Egypt in the 1990s: 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1 p. 99.

⑤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339 页。

管理人员同期所占比例从 0.3% 增长至 2.4%，而产业工人则从 43% 降至 33.8%。^①

埃及劳工的目的地国也因最初的职业不同而有所区别。早期埃及国际劳工主要依靠以朋友、亲戚和同乡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跟随最早一批迁移者选择移民国家。但随着目的地国对国际劳工的限制加强，埃及劳工移民目的地国的选择与职业结构和教育水平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埃及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国主要是伊拉克、沙特、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和利比亚。1987 年，近 95% 的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在上述国家从事不同工种，^②2000 年占到 96%。^③ 上述目的地国可进一步分为两类，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是埃及劳工的首选目的地国，前往这些国家的主要是技术和半技术人员。2002 年，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埃及科学技术人员分别占三国埃及劳工的 40.5%、53.5% 和 41.1%。^④ 约旦、利比亚和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前）为另一类，其中约旦和利比亚毗邻埃及，同时对埃及劳工的限制较少。因此，大量无技术的劳工很容易涌入这些国家。2002 年，前往约旦、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埃及产业工人分别占三国埃及劳工的 62.9%、31.4% 和 62.9%。^⑤

埃及劳工通过国际移民实现了一定的职业地位提升，这种提升偏向来自中间阶层的专业技术劳工，其职业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劳工在海外获得新的工作经验，回国后成功实现职业转变，彻底抛弃原先的老行当。数据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埃及有 17.8% 的回流劳工在海外获得了新的工作经验，^⑥而获得新经验的劳工中有不少进入了建筑行业。对建筑劳工的有关抽样调查显示，1988 年在 10% 出国前不是建筑工人的劳工中，有 43% 在国外是建筑工人，35% 归国后仍从事建筑业。^⑦ 二是进行生产性投资。埃及国际劳工在迁移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其中有小部分进行生产性投资，成为雇主和自我雇佣者。1986~1987 年对埃及六个村落的调查显示，7.6% 的埃及劳工投资制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⑧其中绝大多数劳工或通过购买小型货车和出租车进入运输业，或经营小型乡村零售店，其余部分开设制造厂和修理铺，他们大多是原来有手艺的工匠。劳工投资制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等行业有限，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上述行业需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能力，这是绝大多数劳工不具备的。然而，即使是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有许多人利用个人积

① Ayman Zohry,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gypt: A Pilot Study*, p. 34.

②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335 页。

③ Ayman Zohry,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gypt: A Pilot Study*, p. 32.

④ Ibid., p. 35.

⑤ Ibid.

⑥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340 页。

⑦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Cairo,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2002, p. 99.

⑧ Chrisotph Reichert, "Labour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gypt," *Sociologia Ruralis*, Vol. 33, No. 1, 1993, p. 58.

蓄投资农业,改变家庭生产模式,增加收入。调查显示,16.7%的回流劳工和40.4%原先从事农业的国际劳工,选择投入资金购买土地、农业机械和牲畜。^①

然而,国际移民对劳工职业地位的提升作用依然有限。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后期,埃及回流劳工中的41%在海外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农民;34%的回流劳工就职于出国前同样的工作领域。^②这主要是因为埃及劳工出国前多为无技术工人和农民,他们大多在国外从事生产性工作,未能获得足够的职业培训,回国后依然干老本行,其职业地位自然难以获得提升。

(三)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问题

考察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受教育程度与社会流动问题,离不开研究这些国际劳工下一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国际劳工移民的代际流动,因为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数据和资料,这里只能简要评述移民自身的教育程度,以便从侧面管窥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有资料显示,国际劳工受教育程度越低,对社会流动的潜在促进作用就越大。个中原因在于,中下阶层的国际劳工移民有更强烈地提高下一代教育水平的意愿。研究显示,2002年国际劳工家庭孩子接受教育的比例比其他群体高4.4%。^③

埃及国际劳工的教育结构与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教育结构整体相对应,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所提升。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量未接受教育的埃及国际劳工前往阿拉伯石油国家。但自80年代开始,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劳工开始增加,未受教育的无技术劳工人数下降。据1986~1987年对上埃及明亚省的调查显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参与国际移民的可能性最高,达30.1%。^④与此同时,大量未接受教育的劳工回流,回流劳工的文盲率占回流劳工的比率从1975年的16%增加至1980年末的45.5%。相反,持有大学文凭者占回流劳工的比例从1975年的35%下降至1990年初的2.7%。^⑤需要指出的是,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上埃及明亚省滞留在国外的劳动力中依然有58.8%的文盲,17.7%略知读写,只有19.3%接受过中专教育。^⑥其原因可能是埃及国际劳工主要来自埃及的中下层,其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此外,阿拉伯石油国的建筑业吸收了大量的无技术劳工。

① Chrisotph Reichert, "Labour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gypt," p. 54.

②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339页。

③ Heba Nassar, *Migration,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in Egypt*,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ititue, 2005, p. 26.

④ Richard H. Adams, Jr.,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p. 53.

⑤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339页。

⑥ Richard H. Adams, Jr.,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p. 67.

埃及国际劳工的受教育结构也与其来源地的发展情况紧密相关。1987~1988 年,一项对埃及六个村落的调查显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下埃及村落,其受教育劳工的比率有时高达 53.2%;但现代化程度最低的上埃及村落,受教育劳工仅占 18.8%。^①

(四)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埃及国际劳工在迁移过程中受到现代丰裕的物质生活与传统伊斯兰教理念的双重冲击,海湾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国家的消费社会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改变了该群体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看,国际劳工比国内劳工享受着更好的生活标准(30.05:28.51),基本需求指标也更高(6.6:6.014)。^② 这一改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劳工的侨汇减少了劳工家庭获得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困难,同时推动新的住房建设,拉动并扩大耐用品消费。这既提高了国际劳工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影响了国际劳工的生活方式。在埃及农村,国际劳工的家庭住房在外观和装修风格比较容易分辨,房子上部装修现代,而房子下部风格传统。房子上部一般是劳工回国新建,而房子下部多为劳工父辈所建,这形象地体现出埃及农村正在经历垂直分化。对 1987~1988 年埃及六个村落的调查显示,一方面,高达 73%的国际劳工购买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耗品,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劳工。电视、收音机等现代化设备改变了埃及农村落后的交流方式。^③ 另一方面,国际劳工接触新生活后,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对教育、医疗服务要求更高,2002 年国际劳工家庭享受的医疗服务比例已达 7.82%。^④

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坚守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大力提倡和渲染伊斯兰平等观念,对埃及国际劳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劳工接受伊斯兰传统服饰,并将传统着装的风尚带回埃及国内。大量的侨汇输入埃及国内,所谓的伊斯兰经济迅速发展。数据显示,1991 年有 2.88%的埃及侨汇投资伊斯兰宗教企业。^⑤ 大量汇回埃及的侨汇与传统伊斯兰理念在埃及的扩散,使埃及私立清真寺急剧膨胀,推动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埃及国内社会尖锐的矛盾和从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入的”保守的宗教思潮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传播,并深刻影响着埃及中下阶层的生活方式。

① Chrisotph Reichert, "Labour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gypt," p. 47.

② Heba Nassar, *Migration,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in Egypt*,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ititue, 2005, p. 26.

③ Chrisotph Reichert, "Labour Migr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gypt," p. 52.

④ Heba Nassar, *Migration,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in Egypt*, p. 26.

⑤ Ibid., p. 22.

三、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现代化

埃及国际劳工在移民前大多为社会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无技术劳工,他们大多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换言之,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是直接受益者。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社会流动和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具体的财富分配来看,埃及劳工的国际移民在一定程度阻碍了农村社会公平的实现,妨碍了农村底层人口向上的社会流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在农村,国际劳工的汇款更多地让埃及的中上层受益,这反而拉大了埃及农村的贫富差距。1986~1987年对明亚省的家庭调查将1,000户家庭按是否有侨汇分成两组,每组依次按照家庭总收入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分成五个等级。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中,包含侨汇收入的家庭占10.17%,无侨汇收入的家庭占11.04%,二者差距并不明显。然而,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中,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占比达37.31%,无侨汇收入的家庭占比仅15.76%,^①二者相差近20个百分点。可见,侨汇收入让埃及农村上层更富有,但并不能显著改善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这进一步拉大了农村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不含侨汇划分时的0.236上升至含侨汇划分时的0.271,泰尔指数^②也从0.098上升至0.113。^③因此,埃及国际劳工的汇款在缓解农村贫困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收入的不平等。

其次,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失业问题产生了重要且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吸收了大量的失业人口,缓解了埃及的失业问题。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际劳工人数不断增长,1988~1998年埃及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52万余人,^④远超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使劳工的供求结构矛盾突出。因此,埃及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1976~2001年埃及官方公布的城乡失业率一直在7.7%以上,^⑤且失业人口逐渐趋向年轻化,集中在15~29岁之间的大中学毕业生。其中,农村地区失业率高于城市,农村占埃及总失业人口的52%。^⑥埃及城乡的失业人口几乎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极度贫困。2000年,户主失业家庭占埃及贫困

① Richard H. Adams, Jr.,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pp. 58-59.

② 泰尔指数是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

③ Richard H. Adams, Jr., "Worker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gypt," p. 59.

④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2002, p. 4.

⑤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⑥ Samir Radwa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Egypt: Conventional Problems, Unconventional Remedies*, p. 10.

家庭的 19.69%。^① 与此同时,1973 年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工数量达 14.9 万人,1987 年底增至 158.2 万人,1988~1992 年由于战争等原因大批劳工回国,增幅有所减缓,2000 年重新增至 190 万。^② 可以推定,大量埃及年轻劳动力参与国际移民的过程,有效地缓解了埃及严重的失业问题。

另一方面,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是一种短暂性的移民,埃及官方把所有移民阿拉伯世界的埃及人统计为暂时性移民。受地区局势和国际市场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冲击,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大规模回流给就业带来巨大挑战。埃及内政部的公民出入境报告显示,1970~1984 年间(除 1980 年和 1983 年外),埃及公民移民海外形成潮流,即移民大于回流,随后回流上升。1985 年,埃及公民净回流 66,000 人,1986 年净回流 32.7 万人,1987 年 42,000 人。^③ 据估计,1985~1987 年,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工减少的人数介于 20.3 万人和 30.8 万人之间。^④ 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埃及的国际劳工已经开始渐进性回流。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不仅导致埃及近 54 万劳动力的突发性回流,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存款和不动产,给埃及国内就业市场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又恰巧是埃及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1991 年埃及经济跌至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 2.1%。^⑤ 在这种不利的经济形势下,国际劳工大规模回流对埃及国内严峻的失业问题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再次,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来看,国际劳工移民并未推动埃及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埃及在纳赛尔时期进行的三次土地改革摧毁了大土地所有者群体,农村开始逐渐抛弃原来依靠佃农进行农业生产的模式,转而发展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不过,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受阻。对上埃及巴希亚村(Bahiya)的调查发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劳工的汇款确实使得有些家庭尝试资本主义生产,但随着国际劳工的数量快速增长,加上劳工汇款使中下层女性向家庭生产活动转移,造成农村自由劳动力短缺。与此同时,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将大量土地归还给大土地所有者,并逐步减少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导致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开始复兴。在此背景下,埃

① Heba El-Laithy, Michael Lokshin and Arup Banerji, *Pover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gypt, 1995-2000*,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68, 2003, p. 25.

②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385 页;Ayman Zohry,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gypt: A Pilot Study*, p. 32.

③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337 页。

④ 同上,第 337 页。

⑤ 同上,第 254 页。

及农村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减缓,依靠佃农耕种的传统生产模式重新盛行。^①

就埃及男女平等而言,国际劳工移民对社会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大量年轻男性参与国际移民缓解了埃及社会原有的两性不平等。埃及农村社会深受伊斯兰教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地位普遍不高。大量年轻男性离开埃及农村后,妇女不得不担负起原本应该由男人承担的农业劳动。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其家庭地位的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四、结 语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作为当代埃及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对于埃及社会流动和社会现代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来自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其财产、收入大幅度增长,多数移民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有所提升,一些出身中下阶层的移民跻身中间阶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其次,国际移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埃及的贫困问题,但也加剧了农村地区收入的不平衡,因而未能推动埃及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最后,国际移民极大地缓解了埃及严重的失业问题,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移民的突发性大规模回流加剧失业压力,影响埃及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力流失,使埃及失去了宝贵的人力资源,造成埃及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对于埃及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尤其是对于构建开放的、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而言,必须增强内生性发展动力,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固本开源,避免走主要依托外部资源、外部市场的依附性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赵 军)

^① Soheir A. Morsy, "Familial Adapt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gyptian Labour," *Wome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Vol. 94, 1985, pp. 18-21.